

远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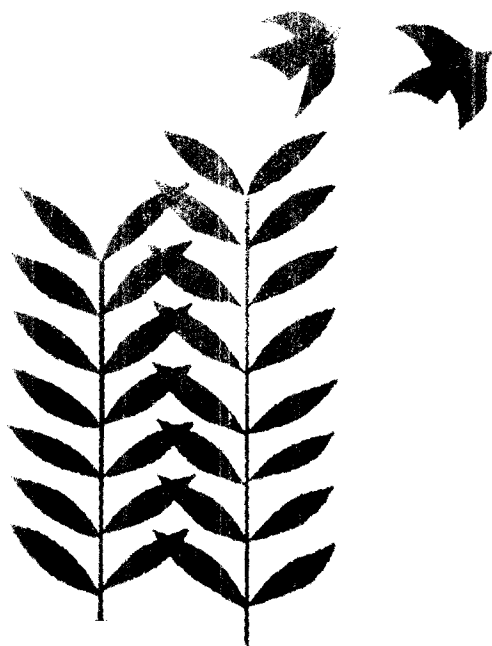
袁鹰



浙江文艺出版社

远行

袁鹰



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严麟书

封面设计 张妙夫

远 行

袁 鹰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25 插页2 字数140,000 印数0,001—7,500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7·49

定价: 0.65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入散文三十六篇，是作者近三年来写下的散文选集。其中有满怀真挚的感情、亲切的友谊，对已故的优秀文学家、艺术家的悼念之作；有用诗情画意的笔调记述江南的见闻。不论怀人忆旧，还是状物写景，都洋溢着作者对祖国远景的向往和追求美好事物的愿望。作品不仅感情浓郁，词句清丽，而且，保持着作者一贯的俊逸风格，读来亲切感人，耐人寻味。



作者近照

目 录

蓦然回首	1
歌手·园丁·斗士	5
——怀念陈笑雨同志	
哭李季	18
送赵丹远行	28
光明行	39
——纪念林淡秋同志	
两位常州老师	49
江流千转	57
寻梦吴江路	63
青山白铁之间	71
三到轩亭口	80
汉口路309号	88
彩色的窗口	94
杭州小札	98
冷泉亭的冷和热	98
柳浪闻莺	102
萧山杨梅	104
浣纱路	106

立马吴山·····	109
净慈何处寻? ·····	111
西泠冷落·····	113
龙井茶 ·····	115
《西湖二集》及其他 ·····	117
“杭州太守例能诗” ·····	120
望江山随笔 ·····	123
山居日月·····	123
绿荫深处·····	126
蝴蝶和蛇·····	128
落红满径·····	130
烟雨富春江 ·····	133
淮安六记(后篇) ·····	137
二十年后·····	137
总理故居前 ·····	140
从韩信到关天培 ·····	142
射阳簪 ·····	144
窈娥巷 ·····	147
故乡水 ·····	150
梦绕神州路 ·····	153
正是深情才动人 ·····	157
汉俳之旅 ·····	162
编余絮语 ·····	191

蓦 然 回 首

一声致哀，万人起立，千山沉寂，万木无声。只听得肃静中偶尔有轻轻的歔歔，仿佛不敢让旁人听到，却又抑制不住要使旁人听到。仿佛好久以来就在等待这个时刻，为十多年来惨死遭诬的前辈和同伴们放声一恸；又仿佛蓦然间才发现我们竟已失去了这么多的英才俊彦，这么多的良师益友。望着面前那份长长的、远非全部的名单，谁都禁不住伤心落泪，悲从中来。

肃立致哀的几分钟内，多少熟悉的面影一个接一个倏然闪过。十九年前，一九六〇年秋天，你们不是也都坐在这大厅里参加上一次文代会，同大家一起，全神贯注地聆听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吗？不是也都曾神采飞扬地谈学习收获、生活感受和创作、演出计划吗？音容笑貌，依依在目，却又恍如隔世——横隔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而今，劫后归来，依旧是星光灿烂的人民大会堂，依旧是欢腾活跃的文代会会场，秋风萧瑟，枫叶如丹，当年作报告的人和听报告的人在何处？那一卷卷雄辩深邃的文章和打动人心的作品在哪里？那千百行情思绵邈的诗句在哪里？那在银幕和舞台上使千万观众击节赞赏、衷心倾佩的丰姿在哪里？那江南韵味的宛转歌喉、泼墨淋漓的生花画笔又在哪里？十多年间，

人世间的许多瑰宝，数不尽的美的结晶，几乎都被那帮魑魅魍魉践踏得一千二净。于是，不期然地想到辛弃疾的那首《青玉案》，把末一句改动几个字：

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
血泪纷飞处。

斑斑血迹，使人回溯到更加久远的年代——

“我以我血荐轩辕”，“左联”烈士以自己的鲜血写下无产阶级文艺史的第一页。伟大的鲁迅为这光华四射的卷首写下发自肺腑的悼歌：“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半个世纪里，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怀笔背琴，在党的旗帜下，在荆棘丛生的祖国大地上，东奔西走，上下求索，抗击黑暗，呼唤光明。在炮火纷飞中献出青春，在敌人屠刀下颠沛流离。春回大地，天朗气清，大家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从心底感到痛快，充满了力量和希望。然而，年复一年，在明朗的天底下也总断不了风狂雨骤，雪侮霜欺，终至举步艰难，动辄得咎。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了那最黑暗、最混乱的十年，许多人被肆意地打翻了，发配了，流放了，甚至被杀害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然而人们在祖国母亲的胸脯上，心贴着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是的，有人说过怪话，发过牢骚，表露过消极和愤慨，可是，大节无亏，在关键时刻，屈膝投降、卖友求荣的毕竟是极少数。纵观古今中外，几曾有过这样象打不碎、砸不烂、煮不熟、蒸不透的铜豌豆似的文艺

队伍呢？……

大风暴开始的那年，大约十一月或十二月，我在北京金鱼胡同西口，偶然遇到韩北屏同志。几个月不见，他显得苍老而憔悴。

“怎么样？”我低声问。

“没什么。”他苦笑一声，从容地说：“相信党，相信群众。”

“还有第三个相信。”

他会心地点点头，然后伸出右手的大拇指，指指自己的胸口。

就这样匆匆告别，紧紧地握一下手，似乎全预感到暂时间见面机会不会象往常那样多而容易了。但是，怎能料到这一握竟成永别呢？

第二年初春的一天，我走过前门外大栅栏，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正伫立在新华书店的橱窗前。相当破的蓝色短棉大衣罩着瘦小的身躯，看上去有点臃肿。那是孟超同志。

他看见我，象过去一样点点头，咧嘴一笑。然后指指那一片红色的橱窗，摇头叹息：“怎么会只有一种书？”

我也只能笑一笑，没有接他的话茬。唉，如果当时会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相晤，我怎么也要在那个橱窗前站下去，谈下去，一直到灯阑人散的时分。

你看，你看，就是这样的人！在自己遭受无端的凌辱，失去自由、生命难保的状况下，甚至被投入挂着无产阶级旗号的监狱里，仍然忧思忡忡，真心诚意地关注着革命事业的成败和人民群众的疾苦。这就是我们这支文艺队伍的主流，这就是在革命洪流中成长的中国知识分子！试问，有这样为人民的事业任劳

任怨的“裴多菲俱乐部”吗？有这样忧国忧民、矢志不渝的“反党黑帮”吗？有这样几十年跟着党走，在各种各样的挫折、磨难面前不变心的“精神贵族”吗？民主遭监禁、法制被摧残的年月，一张小小的纸条，就能兴一场株连瓜蔓的文字狱；几句随口而出的重话，就可以置人于百劫不复的死地！我们以如此沉痛的代价，迎得第二次解放；我们用如此多的血泪，去换取春风春雨。决不再让那旷世罕见的千古悲剧重演，不正是我们这群后死者的严重责任吗？

落座的时候，泪水将人们的心灵洗涤得更加晶莹纯洁，将斗志冶炼得更加无私无畏。好象那一长串死者的名字，都在象大厅顶上的葵花灯一样，闪动着欣慰的眼神，凝视着，期待着所有的后来者。

一九七九年十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

歌手·园丁·斗士

——怀念陈笑雨同志

笑雨同志离开我们十三个年头了。近年来每次去西郊，去八宝山革命公墓，路过永定河桥，我总要情不自禁地望一望桥下清清的河水，心头也就涌起一层波浪。十三年，河水静静地流过四千七百多个日夜，冲走了多少泥沙杂草，冲淡了多少浮光掠影。然而，在那雨暴风狂、飞沙走石的十年中被迫害摧残致死的受害者的姿容，却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清晰。

我是在一九五六年笑雨同志从中央宣传部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之后，才同他认识的。在这之前，我只知道他是杂文家“马铁丁”三个合作者之一。解放初期武汉《长江日报》上马铁丁的“思想杂谈”，曾经引起许多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注意，把它看作帮助自己认识许多大是大非、改造世界观的良师益友。“思想杂谈”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政治斗争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都产生过振聋发聩、循循善诱的影响。许多青年人曾经收集不少篇“思想杂谈”贴在本子上，随时到那里面去找寻打开心扉的钥匙。由于“思想杂谈”的深刻印象，我在结识笑雨的庐山真面目之前，就已知道他是个政治敏锐、见识警辟、能帮助人解决思想问题的人。一九六〇年初夏，他由中国作家协会调到人民日报社，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五

年，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又体会到他不仅是忠于职守、勤于学习的人，更是一个敢于说真话、反对说假话的人，一个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人，一个刚正耿直、坚持党性原则，不畏权势、不搞阿谀奉承的人。平时，他爽朗乐观，肝胆照人，对同志赤诚相见，谈笑风生，一起春游，一起打球；但一遇到有某个“大人物”以权势压人，搞歪风邪气，搞那些反映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低级趣味，他立刻横眉怒向，嫉恶如仇。唯其如此，到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在党的优良传统逐渐受到干扰和破坏，大话空话假话开始代替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年头，他这种是非分明、直言无忌的品德，这种脚踏实地、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作风，自然就显得不合时宜甚至遭忌了。

笑雨同志最早是作为杂文家来到文艺界的。他的杂文，文如其人。从解放初期的“思想杂谈”，直到六十年代初期的，都体现出他的品质、思想和作风，无论是歌颂还是暴露，他都坚持言之有物，不尚空谈，而又鞭辟入里，娓娓动人。他很注意深入实际，从生活的海洋中找题目，写文章。一九六〇年深秋，他带领几位同志到陕南山区略阳县去搞调查研究，写了好几篇杂文。在《山与川》里，他以玉米优良品种“金皇后”在山区并不高产的实例，从矛盾的特殊性讲到必须从实际出发，总结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从撕开云雾所交织成的帷幕看到曙光就在前头”。三年困难时期，他的不少杂文，大多是以振奋精神为目的的，但他鼓的是实劲，不是虚劲，于细微处见精神。

一九六二年初，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

议，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全党认真讨论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毛泽东同志殷切期望全党同志务必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针对当时已经开始猖獗的极“左”思潮，先后再三地向文艺界提出进一步贯彻“二百”方针的精辟意见。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笑雨同我们一起商量，学习《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经验，在《人民日报》副刊上也开辟一个杂文专栏。我们约请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五位作家合作撰写，专栏定名为《长短录》，取长短相较、取长补短之意。从一九六二年五月至十二月，共发表了三十多篇杂文。这些杂文的思想内容，都能针对当时实际，从一些侧面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对当时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党内和社会上的某些不良倾向和歪风邪气，提出了一针见血但又是与人为善的批评。谁也没有料到，事过四年，到一九六六年初，林彪、江青一伙，连同他们那名戴着“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的吓人假面具的“顾问”，为了篡党夺权的阴谋而开始兴风作浪的时候，《长短录》竟在《海瑞罢官》之后，同《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一起，被构陷进一场骇人听闻的血腥的文字狱中。《长短录》的五位作者和主持这个杂文专栏的陈笑雨同志，都被诬为“反党”而横遭凌辱和迫害，笑雨同志本人竟以身殉。

开辟《长短录》时，定了四条方针：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长知识。这四条方针，就是笑雨亲自拟定并经报社编委会讨论通过的。到了一九六六年，它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现在来看看，这四条方针究竟有什

么错？在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奔向四化的新长征路上，不是很需要热情洋溢的杂文，表彰为四化献身的英雄模范和先进集体吗？不是很需要犀利明快的杂文，来匡正当今的时弊，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清除四化进程中形形色色的思想阻力和歪风邪气吗？不是很需要文情并茂、丰富多彩的杂文，来帮助读者打开眼界，破除现代迷信、砸碎精神枷锁吗？“闻鼙鼓而思将帅”，在这场解放思想与禁锢思想的大交锋中，我们的思想文化战线上，又是多么需要更多有胆有识、坚定不移的斗士啊！

在抗日烽火开始燃遍祖国大地的革命高潮中，二十一岁的青年陈笑雨从长江下游北岸靖江县一个小镇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从那以后，一直是新闻战线上一名活跃的战士，从油印员到编辑、记者、分社社长。他带着一支笔，随军转战在几个战场，也随军调部进过北平。全国解放以后，搞了几年行政领导工作。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才转到文艺战线上来。他先后担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会委员兼文艺部主任等职务。而这十年（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正是党的文艺路线不断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干扰的年代。文艺战线从来是政治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可能不受到政治路线斗争的影响，有时这种斗争又最先在文艺界反映出来。从五十年代以后，人们常说文艺工作是“光荣的岗位，危险的职业”。这并非笑话，两个侧面、两种特点的确是同时存在的。但是，这个矛盾恰又反映了一种不正常现象：文艺问题已经开始被人为地同思想问题、政治问题混淆在一起，而且逐渐被简单地划上等号了。在众口烁金的时刻，能够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力排众议，直抒胸臆，不随风摇摆，是

十分难能可贵的。

笑雨正是那种有胆有识、有真知灼见的文艺评论家。他讴歌新时代的英雄人物。他从一批优秀的短篇小说中，讴歌社会主义劳动的美：“新时代、新社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劳动导致人们成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完美的人。”“自然是美的。经过人的万能的双手，社会的劳动实践所创造出来的第二自然更美。”“劳动美的剥削者，决不会对劳动、劳动者的作用作出正确的估计的。新时代的作家是劳动人民的作家，是劳动人民的代言人，理应反映和充分评价劳动、劳动者对推动历史前进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评论家的这种期望，代表了千万读者的愿望和要求，它不是也适用于举国上下一心奔四化的今天吗？

一个忠于职守的园丁总是十分关注刚刚破土而出的蓓蕾。一些刚刚发表或者出版的好作品，常常吸引住笑雨的注意，很快就在他的笔底得到热情的支持和恰如其分的分析。诗人张志民同志的《公社一家人》刚刚见报，笑雨就写文章赞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顽强的斗争意志，浓郁的社会主义生活气息，以及清新刚健、活泼生动的文风，使人读了觉得可喜。”李季同志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马兰》，描绘了一个具有高度革命事业心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革命战士形象，笑雨很快写了文章，称赞它“故事中有诗”，“象他的诗一样，生动流畅，朴质清新”，也指出小说在形象刻划方面不够深刻和丰满。革命回忆录《第一个风浪》（作者邓洪），笑雨特别称道它“用自己充沛的革命热情渗透于笔墨”。

笑雨的文艺评论，不仅有独特见地，不人云亦云，而且能坚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敢于顶风，不趋时附向。当上海的那

个“大人物”别有用心地强调文艺作品主要反映社会主义建设题材、后来更直截了当地提出“大写十三年”的时候，笑雨却用许多笔墨，满怀激情地歌颂一大批革命回忆录，歌颂长篇小说《红岩》和电影《红色娘子军》，歌颂历史题材的电影《甲午海战》；当有些批评家热衷于乱贴“人性论”、“人情味”、“人道主义”标签的时候，他却大声称赞《朝阳花》的“革命的人情味”，专门为一幅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画《我们爱阿姨》写篇短文，题目就叫《崇高的母爱》，肯定这幅画“相当生动，相当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社会生活本质的方面”。他不怕棍子。他说过：“教条主义的棍子，只能吓人，其实没有力量。”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那几次重要讲话，为文艺界吹来一阵阵春风，使我们从“左”的迷雾中清醒了一些。六一年六月，在中央宣传部主持下，讨论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第二年四月，正式定稿为“文艺八条”下发。文艺界的同志开始从总结建国十三年来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中摸索出更健康发展的道路。笑雨带领我们认真贯彻党的文艺路线，从当时文艺战线和文艺创作的实际出发，针对着那种“谈艺术色变”、“谈技巧色变”的种种顾虑，拟定了一批贯彻“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探讨艺术规律的选题。他亲自向一些作家、评论家约稿，也自己动手写文章。

然而，好景不长。不到一年，一股冷风又从斜刺里刮来。一九六三年初，那个后来成为林彪、“四人帮”黑“顾问”的“理论权威”，同江青沆瀣一气，突然举起大棒，朝“鬼戏”